



第五届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召开 法治保障高水平开放 合作促进高质量发展

法眼财经

□ 本报记者 张维

连日的阴雨天,让湖南长沙这座本已春花满城的城市,陷入了过山车式的降温,对于很多人来说,穿上羽绒服出门才能对抗这一波“倒春寒”。

与寒冷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烟火气——隐藏在胡同里的“苍蝇馆子”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五一广场等地标性建筑周边的人群摩肩接踵……这里,是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一角。

一场探求更好经济发展路径的盛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的“第五届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恰在此时此地召开。会议上久违的诸多国外面孔,是国际交流回归正常最直接的表征,也与这场国际会议的主题“法治保障高水平开放 合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相呼应。

“我们要运用法治力量明确规则红线,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以确定性的规则,制度和法治体系提振经济社会发展信心,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柯良栋说。

法治保障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此前,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已举办过四届。历届论坛汇聚政、商、学精英智慧,来自近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企业、律所等各界中外嘉宾3300余人参与其中。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携手应对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以合作互信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法治共识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完善,切实推动国际经贸合作与发展,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多达22项。

今年的论坛在特殊时期召开,更是被寄予更多期

核心阅读

我们要运用法治力量明确规则红线,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以确定性的规则、制度和法治体系提振经济社会发展信心,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待——一方面,世界经济在疫后的复苏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发展新动能也正在不断集聚。如何更好地以法治保障高水平开放,以合作促进高质量发展,是摆在中国及世界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对于中国而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过去十年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柯良栋说。

其中,法治的作用不容小觑。法治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柯良栋说,中国的开放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关于这一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有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新加坡律政部副部长秘书潘家煌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颇为认可:“中国非常重视法治,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中国多个城市推出了相关政策与措施,通过法治造福企业与人民。”

潘家煌还特别以本次会议的举行地——长沙的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例来说明:在中央依法治国办发布的《关于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的决定》中,长沙市赫然在列;长沙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平安建设的最高奖“长安杯”……

有法治的重要保障,就能有好的营商环境,就会有经济的强劲发展。“在国际商事法律领域,长沙一直致力于当好先行者、开拓者,全力打造国际商事法律服务制度。”据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介绍,近年来,长沙围绕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将国际商事法律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开放型经济发展,为推动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前,长沙先后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2022年全市进出口增速实际使用外资、对外实际投资增幅均居中部省会城市的首位。长沙还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在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报告中,长沙名列全国所有城市第六位,稳居中西部第一位。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新的时局之下,中国应如何在法治的保障下走好开放合作之路?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黄进给出的建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法治轨道上稳妥而积极地加以推进。

黄进认为,从国内层面讲,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在涉外法治领域要强化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统一领导,督促落实;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地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是要加快建设完善的涉外法治体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用法等方面入手,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体系,如制定对外关系法,提升涉外的执法水平,强化涉外司法效能,引导企业、公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自觉地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注重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律师事务所、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把涉外法治保障和服务工作做得更有效。

三是要在对外工作中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手段开展对外法律斗争,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柯良栋也特别指出,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有效维护经济发展安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国际经贸争端不仅涉及国际法问题,还涉及国内法问题,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国际经贸争端的重要保障,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我们倡导建设多元化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纷争,以合作和团结思维应对挑战,维护共同稳定的国际经贸格局与经贸关系。”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也意味着中国式法治化建设需要“胸怀天下”,用黄进的话来说,要用“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吸收世界一切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这样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才能够形成中国真正自己的法治文明。

全国人大监察与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也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一切法治文明成果中对我有用的部分,在这一部分,像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追求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当程序等,都是中国法律的内核。”徐显明强调,中国的法治和世界的法治是相通的。

完善法治规则体系,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法治保障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开放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柯良栋说,开放要在制度框架下进行,无规矩不成方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制度体系,强化风险预警和管理。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国际层面来看,黄进认为要推进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柯良栋则提出,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维护公平正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走向关乎各国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加速调整、重构,而贸易和投资格局却未能跟上新的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我们要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多边和区域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实实在在的行动已经开始。本届论坛专设了驻华使领馆、国际商协会与企业双向经贸交流对接会,来自德国、泰国、白俄罗斯、印尼、塞尔维亚、萨尔瓦多、纳米比亚、尼泊尔、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领馆、政府机构、国际经贸组织代表介绍了本国经贸投资机遇,并与来自湖南自贸区长沙片区、三一集团、湖南依诺诺科技、Kilimall、湖南准时达供应链管理等公司的一百多位企业代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对接。

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央企全系统合规管理人员超2.8万人

□ 本报记者 李立娟

近日,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到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厘清主责主业,在提质增效、科技引领、深化改革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加大依法合规管理力度,切实防范化解好投资运营、安全环保等各类风险,塑造长期价值,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在不断强化,国务院国资委也在反复提及。

特别是本月召开的中央企业深化法治建设加强合规管理工作会议上,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强调,“过去一年,中央企业以合规管理为重点,深入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合规管理强化年“确定的44项重点任务,近九成完成率超70%以上,28项超过90%,既定任务基本完成,预期目标顺利实现,中央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68家中央企业集团和631家重要子企业设置了首席合规官,全系统合规管理人员超过2.8万人。68家探索建立了合规管理信息系统,将合规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嵌入业务流程,中心管控与多点联控相结合,提前预警与即时处置相贯通的信息系统不断完善。”翁杰明强调。

通常而言,首席合规官是指监督和管理组织内部合规问题的官员,是企业核心管理层成员,全面领导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

“法治央企建设,其实最早是从2015年国资委颁布《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正式开始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合规与企业法治业务中心总监陶光辉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该意见提出要加快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建立由总法律顾问领导的合规管理工作体系。

到2022年,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明确提出,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席合规官,不新增领导岗位和职数,由总法律顾问兼任,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合规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指导所属单位加强合规管理。

在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总监周丽莎看来,首席合规官制度的建立,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突出任务,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及抓好风险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多年来,中央企业在完善制度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要实现高效治理,必须深入开展依法合规和合规管理,优化依法治理体系,持续推进企业合规管理能力提升。

初步形成三道防线

翁杰明表示,去年中央企业合规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三道防线”初步形成。认真落实“管业务就要管合规”要求,将配备合规管理人员作为重要抓手,不断筑牢业务部门“第一道防线”。法律合规部门认真履行统筹协调和组织协调职责,“第二道防线”责任进一步压实。监管部门切实发挥“第三道防线”作用,形成有效震慑。

在陶光辉看来,“三道防线”是企业合规管理的有效机制,通过“三道防线”,层层把关,逐渐压实,将风险防控在萌芽或初始状态。“谁管业务,谁管风险”,是“三道防线”的精髓,第二道防线起着“专业设计者”的作用,合规管理部门是合规管理工作的牵头部门,对合规管理建设过程中的合规风险评估、合规管理制度出台及合规管控流程设计等,起着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审计监察部门是第三道防线,充当“监督者”,甚至是“对监督的监督”的角色。

翁杰明表示,目前已有近七成中央企业集团和部分重要子企业设立了首席合规官,建立首席合规官制度,是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合规管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

周丽莎解释,首席合规官统筹各种力量,共同推动全局性综合性工作,向董事会和合规委员会负责。被授予五项权力:管理、调配资源,独立汇报,获取信息,参

与决策。根据《办法》规定,重大决策事项的合规审查意见应当由首席合规官签字,则突出了合规审查的刚性规定。这里的“重大决策事项”不仅是经营决策事项,而是应当按照“三重一大”决策制作广义理解,从总法律顾问的参与到首席合规官的必经流程,说明其职责定位发生了变化,由参与者变为必经程序,极大提升了首席合规官在中央企业的职责地位。

合规经营深度融合

“锚定目标、聚焦重点,加快推动合规管理工作走深走实。”翁杰明强调,下一步,要持续深入依法治企,落实《办法》,在深化提升,发挥作用上下真功、求实效,着力推动合规管理工作从形似向形神兼备升级。

翁杰明提出,以首席合规官制度为核心,加强对重大经营事项的审核把关,对违规行为“一票否决”,以完善运行机制为关键,不断健全合规风险识别清单、岗位合规职责清单、业务流程管控清单,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以抓好重点领域为切入点,及时将合规要求内化为规章制度,点面结合切实防范合规风险;以强化案件管理为抓手,妥善处理重大纠纷案件,推进以案促管;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将合规要求嵌入重要流程和关键环节,有效提升工作效能。

推动合规管理工作从形似向形神兼备升级,在陶光辉看来,合规管理工作要取得实效,其本质是合规管理体系在各个方面同时起作用,而不仅仅依赖某个特定要素。合规管理制度,只有与合规管理其他要素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深化合规管理机制的设计,提高与业务及管理流程的契合度,实现合规要求入岗,管控措施入流程,是“合规管理走深走实”的重点。

周丽莎也同样认为,当前中央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风险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必须加快提升依法治企和合规管理水平,强化事前制度规范,健全合规管理保障机制,强化事中动态监管,打造合规管理约束机制;强化事后监督问责,健全合规管理问责机制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合规管理工作,确保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

□ 本报记者 周芬楠

2020年,在深入研究分析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现状和问题基础上,银保监会制定发布《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

记者近日从银保监会获悉,2020年至2022年,银保监会聚焦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等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按照标本兼治、分类施策、统筹推进的原则,深入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健全公司治理三年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推动党建入章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称,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是三年行动方案中的首要任务。

《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要求,国有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推动党建入章也有成效。截至2022年末,95.7%的中小银行保险机构已完成党建入章。建立党组织前置研究机制,92.9%的中小银行保险机构制定了党组织前置研究事项清单。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金融腐败背后的腐败问题,对利用金融资源权力大搞违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侵吞金融资产等行为严惩不贷。积极配合地方纪委监委完善中小机构纪检监察体制,部分银行保险机构已实行纪检监察部门派驻直管管理。

遏制关联交易乱象

股权结构混乱,股东行为失范,违规关联交易猖獗,是近年来中小银行保险机构经营乱象丛生的重要原因。

为整治股权结构,股东行为和关联交易等方面的市场乱象,银保监会严把股东资质关,加强股东资质的穿透审查,依法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人股金融机构,筑牢产业资本和中小银行保险机构之间的防火墙,同时坚决将不合格投资者挡在门外,将违法违规股东清理出机构。三年来,已清退违法违规股东3600多名,转出违规股权270亿股。

严查违法违规为。重点惩治股权代持、虚假出资以及通过违法违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突出问题。三年来,已对近四千名违法违规股东权利进行了限制,分五批次向社会公开124名严重违法违规股东名单。对七百余人次银行保险机构责任人员采取警告、罚款、取消任职资格、禁止从业等处罚措施,责令机构内部问责六千余人次。

优化股权结构,积极支持中小银行保险机构补充资本,同时加强基础制度建设。银保监会发布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协会制定发布股东权利义务手册,健全股东承诺机制,建立股权管理不良记录和严重违法违规股东常态化公开机制。

提高公司治理能力

治理主体履职能力高低直接决定着公司治理成效。提升银行保险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及其成员的履职水平,是三年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提高治理主体履职能力,首先在人才。银保监会按照“金融家办金融”原则,加强高管队伍建设,重点抓中

逾八成公司治理评估问题已整改

小银行保险机构“关键少数”。为助力解决中小银行专业金融人才选聘难问题,监管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建立管理人才库。目前人才库合格人选近1100名。2021年以来,26个省(自治区)中小银行从大型银行引进120多名高管人员。

其次是规范董事会运作。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定,严格禁止大股东和内部人违规干预控制董事会,同一股东及关联方提名的董事占比不超过三分之一,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违规干预董事高管选聘、考核和薪酬,严禁股东直接插手信贷审批和财务决策,要求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对公司的全体股东负责,公平对待所有股东,而不是仅仅对派出股东负责。三年来,一批违规干预董事会决策的控股股东被严肃查处,同时积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公司竞争力和事业成功,是全部投资者、员工、债权人、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联合贡献的结果,必须把维护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作为公司治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合法权益方面,制定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法,积极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压实银行保险机构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持续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检查,深入整治捆绑销售、误导宣传等违规行为,每季度通报银行保险业消费者权益投诉情况,联合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探索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比如,推动成立“青岛市银行保险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目前已累计调解案件1776件,涉及金额354亿元,调解成功率61.77%。

推动机构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鼓励员工有序参与公司治理,在《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中明确要求职工监事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鼓励设置职工董事。三年来,监管部门、金融工会、银行保险机构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完善职工参与治理的有效方式。金融工会2020年以来指导会员单位规范召开45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有关职工薪酬、企业年金、奖惩办法、评先表彰等议题130多个。

增强公司治理能力

监管部门以中央巡视整改为契机,不断提升公司治理监管能力和水平。

首先是健全公司治理监管制度体系,稳步推进银监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修订,积极参与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修改完善,不断夯实公司治理监管的上位法基础;出台《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作为银行业保险业共同遵循的纲领性公司治理监管制度;印发实施《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具体制度,进一步规范控股股东、关联交易、董监高履职、考核薪酬等公司治理重点领域,经过三年努力,监管部门已逐步构建起以《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监管规则体系。

其次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评估机制,要求每年对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状况进行判断、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其实施分类监管。三年行动以来,银保监会先后两次对1800家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公司治理全面评估。目前,前期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率达到83.7%。



3月26日3时11分,随着来自柬埔寨的KR961航班平稳降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国际航线正式通航。首架入境航班旅客3时26分到达海关卫生检疫区,仅用时46分钟就完成所有通关环节,其中单名旅客在海关体温监测、健康申明卡核验、手提行李过机检查环节仅用时30秒。图为成都海关关长毕克新(中)凌晨三点在监控指挥中心指导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首架入境航班检查工作。
本报记者 蔡岩红
本报通讯员 曹显摄